

宋朝的外卖，连皇帝都爱吃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里出现了外卖小哥的身影。

现代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平时工作忙，没时间做饭，周末宅在家，懒得做饭，于是叫外卖就成了家常便饭。但可别以为叫外卖是现今才有的事儿，其实在千年前的大宋王朝，外卖行业就已经非常发达了。

据宋朝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宋朝的白领、精英们跟

现代人一样，下了班也懒得自己在家开火做饭，“市井经纪之家，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饮食，不置菜蔬”。在描绘北宋都城汴京市井生活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就能够“活捉”到一名汴京外卖小哥，他端着两个食盒，刚从店家出来，不知往谁家送着外卖。可见外卖在北宋就已经十分常见。

而到了南宋，虽偏安一隅，政治上窝囊，经济上却一点也不寒碜，其都城临安（杭州），就是一座人口过百万的繁华大都市，不缺钱的老百姓，吃喝玩乐的心思也是爆棚。于是临安城“处处各有茶坊、酒肆、面店、果子……油酱、食米、下饭鱼肉、鲞腊等铺。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，旋买成饮食，此为快便耳”。换言之，宋代都市下馆子或叫外卖成风。

宋朝食肆上的美食，夏有“麻腐鸡皮、素签沙糖、冰雪冷圆子、水晶角儿、冰雪甘草汤、荔枝膏”等消暑凉品，冬有“盘兔、旋

炙猪肉、野鸭肉、滴酥水晶脍、煎角子”这些热气腾腾的烤肉。其中夏天的“冰雪甘草汤”是用甘草、砂糖和清水熬成汤，然后再放凉，放凉以后再加工磨碎的冰块。口感清甜，伴着碎冰有点像糖水冰沙，光听听就觉得很消暑。这冬天的“旋炙猪肉”，“旋”是切块，“炙”是烧烤，就是将猪肉放在炭火上烤，烤得滋滋冒油、猪皮微焦，一口下去，香脆酥嫩。

民间有这么多好吃的，就连在官中吃着山珍海味的皇帝，都无法抵挡诱惑。宋孝宗赵昚（shèn）就对民间外卖情有独钟。他曾因贪凉吃多了民间冷饮，拉了好几天的肚子，吓坏了一群大臣。在隆兴年间的一次观灯节，入夜之后这位皇帝馋嘴难耐，于是叫了夜市上的“南瓦张家圆子”和“李婆婆鱼羹”等宵夜，送进官来，吃过之后龙心大悦，小费给得很是大方：“直一贯者，犒之二贯”，足足多付了一贯（1000

文铜钱）做小费。太上皇赵构也很喜欢外卖。宋孝宗来向他请安的时候，赵构曾特地来了外卖，订单上有李婆杂菜羹、贺四酪面、臧三猪胰胡饼……

虽然那时没有手机，不能网上下单，但是只消差人到饭馆点个菜，“逐时施行索唤”，店家自会送上门来，货到付款。饭菜在外送途中凉了怎么办？宋朝解决问题也非常全面：温盘。温盘是一种厚底的盘子。上下两层瓷，上薄下厚，中间空心，在里面注入热水，盘子便可起保温作用。这装着菜的温盘还得放进食盒里面，食盒形状与现在的保温饭盒很相似，以木制的居多，层层分装，以免菜肴串味。

送外卖这样的活谁来干？虽说《清明上河图》上有外卖小哥的身影，然而在当时，送外卖还不是一个职业，没有统一制服，也没有小电动车可以穿行大街小巷，那时送外卖，无论多远基本靠腿走。 据《文史博览》

“廉政”源于晏婴

晏婴是春秋后期齐国重要政治家，他认为“廉者，政之本也。”把“廉”当作为政的根本，政治的根本，从而形成了“廉政”一词。

史载，齐景公有一次问晏婴：“廉政而长久，其行何也？”晏婴回答，“廉政要像水一样清。清清的水很美，如果它浑浊了，它不会有好的前程，就会把它经过的地方都污染；如果它是清清的，那么它在它所经过的地方，水会把一切污浊的东西都清除了。”这是我国历史上有人对“廉政”一词最早的理解。一天，齐景公问晏婴：“对一个国家来说，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？”晏婴回答：“最大的忧患是社庙的老鼠。”他解释说：“社庙的墙壁是把许多木条联结在一起，外面抹上泥土。老鼠喜欢到这种墙内寄居。人们设法消灭它们时，用火去熏，怕烧坏了木头；用水去灌，又怕毁坏泥墙。因此，老鼠凭借这个原因，作威作福。国家也有社鼠，就是国君亲信的那些小人。他们在朝中隐瞒善恶，蒙蔽君王；在外卖弄权势，欺压百姓。人们如果不杀他们，就会酿成祸患；如果要杀他们，人们会因为他们为国君的宠臣而无可奈何。”

晏婴为相三年，齐国政治安定，百姓富足，而晏婴仍然过着朴素的生活。平时，他吃的是普通糙米，很少吃肉。他退休的时候，还坚持把自己为相的食邑俸禄交还给国家。

据《老年生活报》

女性也可“义结金兰”

义结金兰，出自《世说新语·贤媛》“山公与嵇、阮一面，契若金兰”。是说朋友之间情投意合，志趣相投，进而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结拜为异性兄弟、兄妹、姊妹或姐弟，也就是“拜把子”的意思，被称为结金兰（契若金兰）。这样看来女性之间，异性之间都是可以“义结金兰”的。古人义结金兰时，要交换谱帖，也就是江湖上所说的“换帖子”，这种谱帖也被叫作金兰谱或兰谱。在结拜的时候，根据结拜的人数各用一沓红纸分别写出每个人的姓名、生辰八字、籍贯、父母、祖父母及曾祖父母三代人姓名的“金兰谱”，然后摆上天地牌位，根据年龄的大小，依次焚香叩头，一起宣读结拜誓词，从此便结为异性兄弟姐妹。《易经·系辞上》记载：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同心之言，其臭如兰。意思是说，同心协力的人，他们的力量足以断开坚硬的金属；同心同德人发表一致的看法，人们就会像闻到芬芳的兰花香味一样容易接受。这大概就是义结金兰最早的出处。

而女性义结金兰多发生在闺房之中，相互交换一些闺蜜私物，比如日常佩戴的首饰、香包等，这些形式就特指女性之间的交情。据《今晚报》

“空城计”不是诸葛亮的专利

在中国，诸葛亮用“空城计”退敌的故事妇孺皆知。一般人以为“空城计”是诸葛亮的专利，其实，考诸历史，“空城计”并不是诸葛亮首创，更不是他的专利。

最早记载“空城计”是在春秋时期。《左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载：楚令尹子元带领六百辆战车征伐郑国，进入郑国的桔柣之门，到达大路上的市场，悬挂的门没有放下，有个楚人说话后退出。楚军令尹子元以为郑国守备力量雄厚，又听说诸侯正在出兵救郑，于是就偷偷在夜里退兵了。这大概是“空城计”了。

一些历史评论家根据裴松之所注《三国志》，对诸葛亮是否摆过“空城计”提出质疑，并进而否定历史上不可能有那样的战例。其实诸葛亮摆“空城计”是很有可能，因为这样的战例屡见不鲜，不绝于书。唐代的张守珪是位擅摆“空城计”的名将。《旧唐书》列传记载，开元十五年（727），吐蕃攻陷了瓜州，新任刺史张守珪刚到任，吐蕃又突然来到城下，城里人无不惊慌失色，虽然一个个登上城墙，却全无抵抗的心思。张守珪说，敌众我寡，不可以硬拼，应当以变通之法来制服他们。于是，在城上摆酒作乐，宴请将士。吐蕃怀疑城中有准备，竟不敢攻城就退走了。

宋朝马知节也摆过类似的“空城计”。据《宋史·马知节传》，马知节负责延州一带的防务时，敌人入侵，正好是元宵佳节，他就命令张灯结彩，大开城门，连日连夜开宴娱乐。敌人弄不清虚实，只好退去。

由上可知，“空城计”对诸葛亮来说，前有古人，后有来者，只不过，在小说和戏曲中，诸葛亮使用“空城计”被描述得更出神入化。 据《文史博览》

古代“快递业”严防泄密

古代的国家邮政系统叫作“驿传”或者“邮驿”，是古代政府为了传递文书、接待使客、转运物资而设立的通信和交通组织，官办官管官用。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政府的公文往来和军情传递，也承担一些物资的运输工作。

汉代马递的最快速度是日行四百里。唐代则规定，每天车行至少一百二十里，骑马一百八十里，皇帝颁布的敕令须日行五百里。到了清代，由于军机处的设立，文书传递的速度提高到一昼夜六百里甚至八百里。咸丰和同治时期，由于战火不断、军情紧急，出现了“红旗报捷”，一旦前方打了胜仗，就立刻以八百里的速度飞递，沿途驿站秣马以待，一听到铃声立刻飞身上马，驰往下一站。这就是我们在影视剧里常常听到的“八百里加急”。这些“快递”业务虽然高效，普通百姓想要享受却不可能——国家邮政系统不接受民间订单，所以民间通信大多靠私人捎带。

保密是古代“快递业”非常重要

的问题。为了防止中途泄密，被人拆看或伪造，古人采取了不少特殊的手段。

以秦代为例，当时有严格的交接和登记制度。防止泄密最重要的手段是密封。在秦代，文书写在竹筒上，传递前人们都会将邮件捆扎妥当，在结绳处使用封泥，并盖上相关印玺，以防私拆，写在绢素上的则要装入书袋中。到了汉代，封装工具和手段更加丰富，外封套有函、篋、囊等，根据物件的形状、大小，分别装入不同的包装袋中。

清代邮件的封发、保密和防损工作做得更好，有“重封入递”“木匣入递”“绢袋封发”“汇总封发”“长引隔眼”等多种装封手段。清代在速递奏折一类的重要邮件时还有专用的封装程序，使用“封桶”“报匣”“夹板”等封套，外人是绝对看不到的。

由于古代快递多为政令、军务一类，如果“快递”变成“慢递”，或将邮件递错、丢失等，将会受到严惩。 据《解放日报》

梅尧臣反对吃河豚

宋代人爱吃河豚，因为它味美，也与苏轼有关。1084年春，苏轼赴任江苏常州团练副使时，当地有一位善烹河豚的厨妇请苏轼去吃河豚，想借苏轼的名气来抬高自己的身价。苏轼应邀赴宴，只顾埋头大吃河豚，未发一语，躲在屏风后面观看的厨妇大失所望，忽见苏轼放下筷子，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“也值一死！”这就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“拼死吃河豚”一语的由来。

梅尧臣则坚决反对“拼死吃河豚”。在范仲淹款待梅尧臣的饭局上，有一位来自江南的客人绘声绘色地讲起河豚如何美味，引起范仲淹的极大兴趣。梅尧臣认为，为了享用河豚这道美味，冒生命危险，不值得，他当即赋诗《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》，劝范仲淹不要冒险品尝河豚。这首诗，让梅尧臣名满天下，也因此获得“梅河豚”的雅号。

据《半岛都市报》

隋炀帝曾用武力征服台湾

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远在新石器时代，中国大陆东南地区的印纹陶文化就已经传播至台湾。而隋代称台湾为“流求”。关于台湾和大陆这时期的相互往来，可以从《隋书》的文献上得到证实。

隋炀帝是一位有志于“海上远略”的君王。《隋书·流求传》记载：隋炀帝“大业元年（605年），海师何蛮等言，每春秋二时，天清风静，东望依稀，似有烟雾之气，亦不知几千里。”隋炀帝虽然没有急于表态，但内心还是蠢蠢欲动。

大业三年（607年），隋炀帝根据海师何蛮奏报，“命羽骑尉朱宽入海，求访异俗。何蛮言之，遂与蛮俱往，因到流求国。”这一次到了流求国后，因为言语不通，只是掠一人而返。对于这样一个结果，隋炀帝深感不满。大业四

年（608年），隋炀帝“复遣朱宽招抚流求，流求王不从，朱宽取其布甲而归。”“布甲”，流求人用苧麻纺织成布后编织的铠甲。两次和平招降不成，隋炀帝有些恼火，决定以武力征讨。

《隋书·陈棱传》记载：隋炀帝“大业三年（607年），陈棱拜武贲郎将；后三岁（大业六年，610年），与朝清大夫张镇州发东阳兵万余人，自义安泛海，击流求国，月余而至。流求人初见船舰，以为商旅，往往诣军中贸易。”随后发生的事情，在《隋书·流求国》中有所记载：“初，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，有昆仑人颇解其语，遣人慰谕之，流求不从，拒逆官军。棱击走之，送至其都，频战皆败，焚其官室，虏其男女数千人，载军实而还。”

带着隋炀帝对流求“先礼后兵”的方针和策略，肩负皇帝对

自己的重托和厚望，陈棱再次漂洋过海来到流求。由于招抚行动受到了当时流求统治集团的强烈反对，流求王欢斯渴刺兜甚至派兵对抗，拒绝接受“招抚”。和平解决流求问题的计划破灭后，陈棱只得率军使用武力迫使使其臣服，结果大败欢斯渴刺兜兵。陈棱乘势攻破流求王的都城，杀死了流求王欢斯渴刺兜，并俘虏了一万七千人而还。

隋炀帝杨广对台湾的征伐，不过是当时我国的封建统治者对台湾的一种短暂的经略行动而已，没有考虑打下台湾来以后，该怎么管理台湾和发展台湾，而只为逞一时之能，泄一时之愤，所以使隋炀帝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变成了“虎头蛇尾”，甚至有些徒劳。尽管如此，隋炀帝对台湾的行动，毕竟给后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，提供了进一步了解台湾军情、民情的机会，为台湾后来的归附提供了参考。 据人民网